

“情系革命”的瞿秋白

□ 闫书华

我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20多岁作为记者、翻译赴莫斯科工作，从事党的早期理论探索，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长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1935年被国民党拘捕，拒绝劝降出卖信仰和灵魂，英勇就义时年仅36岁。

情深义重的革命伴侣

深入“认识”瞿秋白，是从“秋之白华”开始的。瞿秋白曾刻下一枚“秋之白华”的印章，寓意与杨之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一段感人至深又来之不易的感情。在当时人们思想相对保守的情况下，优雅执着的瞿秋白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三则启事，昭告与杨之华的結合。

杨之华是瞿秋白的第二任妻子，生于浙江省萧山县坎山镇，聪慧活泼，性格温柔。先前遵从父母之命嫁给杨家世交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为妻。沈杨虽然青梅竹马，但成长过程中，思想差距逐渐拉大。杨之华追求进步，向往苏俄，具有革命的气质。参加过萧山农民运动，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发表过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1924年1月，在沈玄庐的帮助下，考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为瞿秋白的学生。在上海大学的学习生活过程中，一方面，杨之华跟丈夫之间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裂痕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上的接触，瞿秋白以他学贯中西的博学多识，经历过赤俄熏陶的革命气度，加上雄辩的口才和充满逻辑力量的思想，逐渐走进了杨之华的心中。

而此刻的瞿秋白，浑然不知。1924年秋，瞿秋白爱妻王剑虹因严重肺病在上海去世，作为王剑虹同学兼好友的杨之华在王剑虹病重期间，多次看望并照顾过王剑虹，她目睹了王剑虹病逝带给瞿秋白的沉重打击。很长时间，瞿秋白都没有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此时杨之华的陪伴则给予他极大的精神支持，缓解了他失去亲人的痛苦，帮助他重新面对新的生活，投入到国共合作的紧张工作中。在极端的斗争环境里，瞿秋白与杨之华这对各自心怀伤痛又志趣相投的革命师生由异性友谊发展到相互爱慕。于是，杨之华萌发了先离婚再与瞿秋白结婚的想法。在邵力子的支持和建议下，瞿秋白随杨之华回到浙江萧山，与沈剑龙经过几乎一整夜的谈话，最终达成和解。

于是便有了11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轰动一时的三则启事：自一九



瞿秋白就义前最后留影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沈剑龙与杨之华正式脱离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合恋爱关系、沈剑龙与瞿秋白正式结合朋友关系。这三则启事持续刊登了三天，瞿秋白与杨之华于11月18日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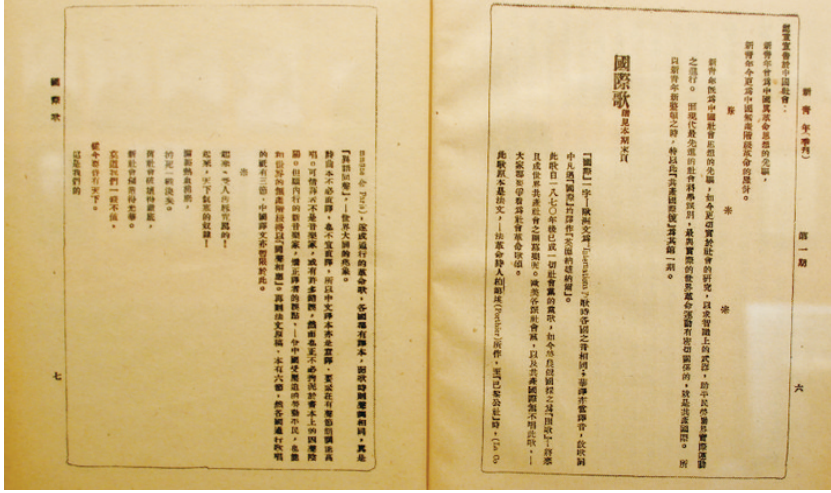
瞿秋白温文尔雅，博学多识，杨之华朝气蓬勃，热情开放，她与瞿秋白在相互鼓励、扶持中携手走过了10年的岁月，他们的爱情，是夫妻与战友的双重结合。两个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建立的爱情，造就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一段佳话。

坚持真理的革命斗士

说瞿秋白是革命斗士，源于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担当精神。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北伐战争的形势和国共统一战线等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实质为根据北伐战争的形势，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主持会议的陈独秀认为当时政治形势发展的特点是联合战线有分裂的危险倾向，并提出了七项挽救破裂的策略，其重点就是要中共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实际就是把与右派斗争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身上，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汪精卫来领导。

其间，瞿秋白因肺病复发，只能抱病一边工作，一边休息。养病期间，针对汉口特别会议为了维持统一战线的“特别政策”，瞿秋白开始对党内正在形成的右倾错误产生了警觉，开始整理自己从1923年1月至1926年12月在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政治论文及部分文艺著作，拟自编一本《瞿秋白论文集》，力求从根本上、理论上阐述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共



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

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因陈独秀等人把武装起义的领导责任让给资产阶级和准备不充分均告失败。之后，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经过30个小时的英勇战斗，上海工人阶级以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占领了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成功。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半个月、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召开了党的五大。让陈独秀想不到的是，体弱多病、书生意气的瞿秋白早就做好了挺身而出的准备，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抗争。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该书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矛头直指陈独秀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义薄云天的革命英烈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长征后，瞿秋白因患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央决定派人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到上海就医，但在福建长汀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失败而被捕。中共中央组织了一系列营救均未成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向蒋介石求情遭到拒绝。蒋介石说：“瞿秋白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好还是让他自首投降。”遂电令驻福建长汀的第36师师长宋希濂劝降，瞿对宋说：“我不是

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考虑到瞿秋白的影响力，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陈立夫指派特工总部行动科的王杰夫、陈建中从南京专程赶到长汀，用尽各种手段逼迫瞿秋白投降。为了达到目标，他们甚至在劝降条件上做了妥协，要求瞿秋白：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关去担任翻译即可。瞿秋白断然拒绝：“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是国家前途的光明。”瞿秋白还列举大量事实，向他们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6月14日瞿秋白在他们来“辞行”时说：“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第二天这两人灰头土脸返回了南京。陈立夫恼羞成怒，立即发电报给在武汉的蒋介石，说瞿秋白不可挽救，宜速对其处极刑。6月17日中午，蒋介石又直接给宋希濂发出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的电令。

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说，记者曾赶到瞿秋白被扣押的卧室，见到了他书写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的辞世绝笔。行刑前，瞿秋白先到实施处决县城的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泰然自若漫步走向刑场，一路上高唱《国际歌》《红军之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面无愧色。到达刑场后，盘膝而坐，慷慨就义。



英勇斗争的“地窖英雄”

“地窖党校”的党性教育，极大增强了党员和武工队员们的革命和纪律意识，坚定了他们的革命意志，激发了他们出生入死、不畏艰难险阻、誓与敌人拼斗到底的大无畏精神，催生了以“地窖三英雄”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为打开澄西地区革命局面、迎接苏南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与干部保障。

武工组长吴雄武及组员徐银林、李银生，长期以贯庄地窖为据点，坚持对敌斗争，后来被当地的伪保长高生海告密。一天拂晓，国民党军统特务唐少云带了100多名敌军包围了地窖。敌人揭开洞口喊话，窑中高声回答“叫陈锡畴（伪澄西区长）下来讲话”，三人一齐举枪对准洞口，见人探头就打，一个敌人左臂上中了一枪。唐少云无计可施，就架机枪对着洞内疯狂扫射，并把手榴弹系在竹竿上伸到洞里引爆，又把稻草火把塞进洞里烟熏火烤。三人始终坚贞不屈，最后，他们拆毁了身边的武器，在高唱革命歌曲、高喊革命口号后壮烈牺牲。



以党建引领实现基层治理“三个转变”

□ 丁晓芳

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治理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必须发挥党建的龙头引领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动基层治理体系、治理方式、治理环境实现“三个转变”，打造社会治理新格局。

着眼于党建聚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由“单打独斗”向“整体推进”转变

乡镇、街道和村社区是社会矛盾的直接面对者，由于权限有限，破解矛盾的能力明显不足。必须通过推进治理重心下移、组织联建等，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统筹力，形成合力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

探索“小网格”“大党建”，实现街道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因此，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基层，把基层治理同基层党建结合起来。在街道层面，通过整合“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平台，派驻市场监管、综合执法、自然资源、生态环保等部门进驻街道（镇），下放考核权和干部调动一票否决权，赋予基层最大管理权、话语权和指挥权，有效破解属地街道（镇）“看得见、管不了”和部门“管得了、看不见”的问题。在社区层面，建立全科网格，要求每个网格员开展巡查、走访群众。网格员通过“网格通”，第一时间将问题一键上报流转，部门在规定时间内解决。

探索“小社区”“大党委”，实现社区吹哨、党员报到。一个社区往往几千人，但社区工作人员才几个人，每天面对各种琐碎的事务，往往难以应对。必须坚持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探索建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环物委、社会组织、共建单位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的基层治理体系。通过设立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这一组带，将驻区单位党员负责人、业委会、物业公司党员负责人及辖区党员民警、城管、法官、律师等纳入在内，加大社区党组织与物业、业委会、辖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整合各类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发动辖区单位积极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来。

着眼于党员带群众，推动基层治理格局由“自上而下”向“上下互动”转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更加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努力做到治理为了群众、治理依靠群众、治理成果由群众共享。

围绕群众转。互联网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越来越便捷，但面对面、心贴心地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丢。要坚持群众需求导向，聚焦群众“天天有感”的民生关键小事，深入基层一线，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切实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积极畅通群众反映诉求渠道，注重发挥“两代表一委员”的桥梁纽带作用，探索“代表夜聊”“委员议事”等做法，通过代表委员闭会期间更接地气地收集民意，高效地解决民生问题。

带着群众干。突出群众主体地位，更多地发动和依靠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让群众参与决策和治理的全过程，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让群众从基层治理的“旁观者”向“参与者”直至“主导者”转变。积极探索“村民说事”等新时代枫桥经验，围绕村庄建设、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党群关系和党风廉政建设

设，在田头地角、村庄庭院、街道商店及纠纷现场等一线说事议事。

做给群众看。基层治理，干部有为是关键，群众满意是标准。要树立一线导向，积极鼓励党员干部激情干事、担当有为，注重培养一批热心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基层干部。要树立实干导向，以实绩论英雄，把工作成效、群众满意作为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要突出“依事见人”、一线考察，全程纪实、奖优罚劣，让干实事的干部不吃亏，让不作为的干部有压力。

着眼于党风促民风，推动基层治理环境由“传统保守”向“文明法治”转变

推进基层治理，必须坚持上级要求与基层实际相结合，做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既讲法治又讲风土人情。

强化核心价值观引领。基层思想文化建设是基层治理重要的阵地，要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文化建设，开展农村（社区）党员的思想教育，守牢这块阵地。要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乡村振兴战略、全面从严治党，组织开展基层宣讲活动，推动新思想新理念在基层生根开花。要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设立党员“红黑榜”等方式，有力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在乡村振兴、环境整治等方面的示范带动作用。

坚持依法治理底线。探索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实施阳光村务，明确村干部权力“边界”，规范村干部用权行为。探索推行“执法进小区”，组织综合行政执法、住建、交警、公安、市场监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有效破解小区内违章搭建、跨门营业、占绿毁绿、违章停车等群众反映强烈、投诉久拖未决的问题。要注重规范文明执法，创新推广“非接触执法”等执法模式。

发挥村规民约作用。村规民约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自治规范，是维护乡村生活秩序的有效手段。要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推进垃圾分类、治水拆违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抵制陈规陋习，引导村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注重先进典型文化引导，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培塑典型、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革命时期的“地窖党校”

□ 王 锋

利用各级各类党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确保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这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70多年前的“地窖党校”，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从“支点户”发展为“支点村”

苏南作为长江三角洲地区工商业最发达、经济最富裕的地方之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区位上都对南京国民政府有着重要意义。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以及在重庆谈判中向国民党作出的让步承诺，新四军在浙东、浙西、苏南、皖南的部队先后北撤到长江以北地区。国民党为了加强其在苏南的统治，大力强化反共体制，对新四军留守人员进行“清剿”，留守人员被迫转入秘密活动。

在隐蔽斗争时期，为应对敌军的“清剿”和搜捕，在江阴澄西地区站稳脚跟、打开革命局面，留守人员根据“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争取胜利”十六字方针，以当地的地下党员和基本群众、烈军属和武工队的知亲好友为基础，建立武工队隐蔽落脚点的“支点户”和“支点村”。最早的“支点户”设立在璜土胡家桥凌福

娣家中。凌福娣的丈夫叫胡森度，是抗战初期中共澄西区委交通员，儿子胡汉是党的地方干部。1942年5月，胡森度遭日伪逮捕，坚贞不屈，被装进麻袋活活打死。凌福娣继承丈夫遗志，接任交通员，把自己的家变成交通联络点。凌福娣还在全村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使胡家桥由她一家“支点户”发展为“支点村”。据《璜土镇志》记载，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璜土境内先后开辟供武工队食宿、负责收集情报、站岗放哨、保证安全的“支点户”就有近20家。

正是由于凌福娣等“支点户”和“支点村”革命群众的协助和掩护，党组织才能在这一地区站住脚跟，并根据特殊地形开办“地窖党校”，加强对党员和武工队员的党性教育。

依托“地窖党校”开展“地窖斗争”

1947年，国民党要塞司令部与国民党江阴、无锡、武进县政府配合，对江阴地区联合进行了大规模的武装“清剿”。为了避开敌人“清剿”锋芒，便于自身的隐蔽斗争，澄西和沙洲党组织在支点户、支点村基本群众、积极分子的掩护和协助下，构筑隐蔽安全的地窖（或密室）。澄西在璜土贾家头、卞家桥、利港东奚市等地构筑地窖20多

个，沙洲在常家埭、吼山房、五圩埭等地建有10多个地下室，供白天隐蔽、活动之用。在这些以地窖、地下室为主要形式的联络站点，大部分有不脱产的地方武装小组配合武工队开展活动，传递情报，侦察敌情，送信带路，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地窖为依托，澄武锡工委于1947年春举办了党训班，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政策水平，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地窖党校”。“地窖党校”由澄武锡工委负责人张志强、王鹏主持，在“圆顶屋”和“丫叉铺”等地窖中举办，对20余名武工队员及秘密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进行了轮训。主要内容是：形势教育，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坚定革命必胜的信念；气节教育，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革命气节，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政策策略教育，如对首恶的镇压政策，分化瓦解敌人的收买政策、利用政策，以及统战政策和开展合法斗争的政策等。张志强、王鹏亲自授课。轮训期间，学员们还用地下党员从上海购来的一台美国产“真谊之”短波收音机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逐字逐句地收录、翻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国民党党政机关、驻军营房、地主恶霸家中投递，弄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轮训时，还审查、吸收了一批新党员，在简陋的地窖里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